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聿学者文库】



Lost “Renaissance”:

The Dawn of Modern China’s Civilization

失落的“文艺复兴”

——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

卢兴基 /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失落的“文艺复兴”

——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

Lost “Renaissance”

The Dawn of Modern China's Civilization

卢兴基 / 著

K250.3

L79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落的“文艺复兴”: 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 / 卢兴基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1092 - 0

I. 失… II. 卢… III. 文化史 - 研究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K248.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7396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失落的“文艺复兴”
——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

著 者 / 卢兴基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魏小微
责任校对 / 龚道军 王新侠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8.5
插图印张 / 1.5
字 数 / 522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092 - 0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提起本书的写作，还要从30年前说起。

20世纪70年代，我正“下放”在内蒙古的一所师专教书。逢“批儒评法”，系里交给我一个小班的工农兵学员，分得评“法家”龚自珍的任务。龚自珍，我对他是既熟悉又陌生。我了解他的文学和人生，却从未读过他的政论和“疑义可怪”的哲理文，但我知道他不是什么法家。或许“法家”的含义在那个时候变了，凡主张变革的都是“法家”。我就是这样跟着潮流，带领这一批年龄相差很大、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学员一起开始“评”起来的。我很想教给他们一点真正的知识和读书的方法，于是交给他们每人一诗一文，去查字典、辞书以及其他工具书，先把诗文注出来，读懂，翻译成现代汉语。他们都这样做了，很认真。虽然不能说都很准确，存留的问题也不少，但在我心里觉得他们是很可爱的。从我自己来说，读龚自珍的全集，反而完全证实了我以前的他不是法家的看法。他出身经学世家，早年跟从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学习。段玉裁是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又是经古文派的汉学家。龚自珍28岁以后又改习公羊学，走上经今文学的道路，但仍然在儒家经学的范围内。他是从公羊家义的“三世”、“三统”说走上社会批判的道路的，和法家毫无关系。龚自珍用公羊家说作为理论武器，批判清朝的封建末世，呼唤未来的“大同”新世界。他坦承：“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这也是后来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用来支撑他们的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明显是属于公羊学体系的。前两本书从表面看很像是清代的考据学著作，实际并无严密的考据学方法，考据只是一个外表。他们的公羊家观点，是从龚自珍那里来的。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龚）自珍确与

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又说：“自珍性跌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即卢梭）……往往引《公羊》议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均见《清代学术概论》）卢梭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梁启超从性格到思想都把他和龚自珍作了对比，说明龚自珍思想所具有的近代启蒙性质。这使我改变了一个看法：原来，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的代表提出改造社会的理论主张，并不都是从西方搬来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已经有了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属同一性质的思想。

我国目前的近代史是以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为界线的。思想史和文学史都把龚自珍划为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人物。19 世纪末的改良派，被认为是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代表，他们登上清末的政治舞台并推进维新运动，固然是受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但也受到自身民族已经出现的启蒙思想的推动。龚自珍的思想影响，是他们自己坦然承认的。但龚自珍并不是我们目前所界定的近代的人物。他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鸦片战争爆发的次年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就去世了。他虽然也接触了鸦片、鸦片贸易的问题，鸦片战争爆发时，他作为坚定的禁烟派，支持过林则徐，但他的启蒙思想和社会改革的理论却是借用了我国自有的一种古老的学说产生的。

由“批儒评法”引起的对龚自珍的研究，是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发表几篇有关龚自珍的文章的成因，其中一篇关于“丁香花案”的文章，还是经已故的钱钟书先生指点，并提供线索的（题为《龚自珍己亥出都与“丁香花案”》，发表于 1985 年的《艺文志》）。

龚自珍张扬的公羊家说，在清代崛起的时间已是乾隆年间了。它以常州学派为代表，倡导者为庄存与，随从的人数不多，在龚自珍以前也还并未形成社会批判的理论，但对于康、梁维新派产生影响的我国自身的启蒙学说也并非仅仅是龚自珍，此外，梁启超还提到了另外一些人物和思想，尤其是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他说：“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也。（黄）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甚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对于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梁启超认为从此打破了宋明理学家“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他评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

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此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对稍晚的戴震，梁甚至认为他的《孟子字义疏证》能“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之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阃室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他所说的“情感主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主义。这都说明，维新派领袖自认中国曾有过自己的启蒙思想，并从中受到过启发。但同时，梁启超也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他只看到了清代思想家的启蒙成分，却完全抹杀了明代16世纪嘉靖、万历以来在思想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把清代的成就与明朝对立起来，说“清代思潮”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他完全没有看到明代16世纪以来思想领域有过的以泰州学派和李贽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于程朱理学的批判，抹杀了明代16世纪以后存在着两种思想的对立，而笼统地以“宋明理学”称之。梁的这一认识，是清朝剿灭了明代启蒙以后促成的。把16世纪以后明代的文化思想，包括王学和泰州学派、李贽，以及其他所有的表现都列为“反面教员”，在清人那里，几成思维定式。清代的人，包括梁启超，或批评，或表示不屑的态度，绝少肯定它的进步成就。一直到五四运动，才有人感到这是一桩覆盆300年的大冤案。郑振铎先生在为焦竑的《焦氏澹园续集》写的跋中就指出：“明人集浩如烟海，四库失收者多矣，或出于有意，或出于无意。当时四库馆臣诋谰明人著作，无所不用其极，是自有其政治作用。今日我辈正应实事求是，为许多明代作家鸣不平也。”^①焦竑是李贽的忘年交和志同道合的挚友，也是明代启蒙先驱之一。他的《澹园集》正、续集，《四库》没有收入，自然不是无意的疏忽。由此可知，为什么明代16世纪掀起的一场启蒙巨澜，到了清朝，竟然成了一片盲区，其中像梁启超这样的开始有所觉醒的知识分子竟也毫不知晓。直到今天，我们许多人的认识仍不免混乱，郑振铎先生的愿望还远未实现。

梁启超也对16世纪明代思潮进行过批判，甚至还说：“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清初大师“皆明学反动所产也”。他所说的“晚明理学”和“明学反动”，笼统地把泰州学派和李贽都包括进去了，殊不知泰州学派和李贽等所掀起的启蒙思潮是反理学的，只是到了清代才被视为“空疏不学”的空谈而受到批判。这一点，我们在梁启超身上也可以看到。明代16世纪的启蒙文化在清代的失落，是清朝统治者文化钳制政策

^① 郑振铎：《西谛书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294页。

的成功，也是顾炎武等人批判空谈误国的后果。殊不知，从清初大师们开始，清代的启蒙表现，不过是明代启蒙的残存和复苏。清代的思想家们虽然各自阐发着缜密的理论，但已不属于一个统一的思潮。由于处在清人对于明代的启蒙已经出现生疏、抗拒的状况下，连梁启超也不知像王夫之那样的“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戴震的“情感哲学”之类，不仅在泰州学派和李贽那里早就有过鲜明的表述，而且在明代中后期的文艺作品中，也是反复表现的主题。清人批判和鄙薄明学的遗风，在梁启超身上也有所表现。

清初的思想家经历了明朝的亡国，他们都批判过明学的空谈，但每个人的表现却有微妙的不同。黄宗羲属于明学的余波，侯外庐先生认为顾炎武属于“宋学余波”，所以不忘君臣父子的伦常，说：“教化纲纪为不可缺”（《与人书》九）。这类思想对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人都有影响，与康、梁走变法维新的改良道路极有关系。这说明清代的思想领域从清初开始就存在着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还表现出他们自身体系的矛盾性。这使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一些学者在分析《红楼梦》进步思想的根源时，归结于清初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唐甄、颜元等人的市民思想及其影响。而何其芳同志在查对原书时，却发现了上述思想家主张中的一些相互抵牾之处。这一场论争后来并无结论，其实，这并不是“市民说”者举证的错误，而是清初思想家本身就存在着复杂的一面。在明代16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身上却很少有这一现象，他们对程朱理学和礼教的批判毫不犹豫，比起清初思想家，虽然还缺少某种理论的深邃，但却义无反顾，汇成一个共同的思潮，这是清代所未见的。

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陈邦炎先生约我为他们的《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编写《顾炎武》一册，因而促进我学习相关历史和思想史的一些著作和史料。虽然后来写成的小册子仍是沿袭传统的观点，但却让我对有些问题有了更深的思考。其时，谢国桢先生还健在，他是我院历史所的明清史专家。那时谢先生还与我所的孙楷第先生挤在同一套住宅里，我因工作之便，常去向谢先生讨教。和孙先生一样，谢先生也藏书颇丰，藏书中有不少是外面不常见的明清典籍，向他借阅，他从不吝惜。我一直感念着这位前辈。

我早年的兴趣在明清小说，50年代的第一篇习作就是关于小说的。但《文学遗产》的工作不能由我拘守这一领域，中间又有一段教书生涯，古典文学需打通了讲。“批儒评法”以后，又是“评红”，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难免就杂了。但“评红”却让我有机会重读《红楼梦》，所以80年代初发表的

几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虽与龚自珍、顾炎武都无关系，但却促进了我对中国自身的启蒙过程的思考。涉足《红楼梦》研究，我发现这一领域的专家学人是如此的多。红学之外，又旁添出曹学、探佚学乃至新索隐的学问，因而又感觉以我之愚拙，跻身其中，无非是多余。逢此文学艺术的又一个春天，有一些过去少有人涉足的禁区正不妨去作一番探索。恰好这时《金瓶梅》学会筹备成立，而东北大连图书馆也准备将积年独家珍藏的才子佳人小说整理出版，有关的学术会也准备召开，都来邀我赴会，因此我又转投入这一领域。

《金瓶梅》和才子佳人小说，过去都曾遭受冷遇、非疵。它们都产生在明代16世纪以后，两者之间，也有一点渊源关系。在摸清明代小说的总貌后，我惊奇地发现，所谓明代小说，除了早先的两部“世代积累型”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以及冠在罗贯中名下的其他几部以外，所有100多部长篇小说和由“三言”、“二拍”开创的短篇“拟话本”，加上才子佳人的中篇，竟然都是明代嘉靖、万历以后，也即16世纪以后产生的，而这一时段仅占整个明朝的一半。在这一过程中又有大量的文人参与进来，从事评点，作序鼓吹。坊间也竞相出版，出现了商业性刻书的繁荣。小说从此脱离了说书，进入文人创作、依靠阅读传播的时代。不唯如此，号称明代戏曲的代表——传奇，也在东南沿海首先繁荣起来，代替了杂剧的地位，还出现了许多精湛的曲家和不同的曲派，它们都是在明代商品经济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初见的时期诞生的。受启蒙文化的影响，批判礼教，批判旧的婚姻制度，反禁欲主义，表现着全新的价值观和人文思想，与诗文领域反复古的个性主义、“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思想互相辉映，加上绘画领域文人画的崛起，并替代了院画的统治地位，都应该是那个时代特殊的文艺表现，属于中国自身的“文艺复兴”。

说我国也曾有过“文艺复兴”，这并不是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实际上，类似的探讨早已经有人做过了。20世纪30年代，任访秋先生就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从袁宏道研究，扩大到三袁、公安派以及以李贽为代表的16世纪明代文化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在探讨我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中，说明明代思潮已具有新的启蒙特质。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将该系列论文辑成《中国新文学渊源》一书出版，加上他的另一部著作《袁中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任先生都题赠与我，恰好我也正在思考这一问题，因此从阅读中得到了许多启发和新的认识。现在任先生已经作古，只能保留心的纪念了。

我国自身的启蒙文化运动，相当于欧洲 14 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不过它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乱、经济倒退、新王朝的重树理学、大兴文字狱等多重压力下沉落的。但它的文化表现却并未在一朝一夕中被摧毁。我在本书的绪言中提到：“这样的文化创造，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像清剿思想一样被轻易抹去和埋葬掉的，它们应该仍然活在我们的文化遗存中，仍然散见于我国的文学、戏剧、美术、绘画等各个门类的历史记叙中。就像一顶皇冠被打落了，它上面镶嵌和缀饰的珠玉散落一地一样，历经岁月，人们已不知道这些珠玉是从这顶皇冠上散落下来的。它们有的已被埋在泥土里，沾着泥污，有的甚至已被视为沙砾，但多数仍可以让我们看到它们的光芒，只是已没有了原来在皇冠上所具有的夺目灿烂。那顶皇冠的整体的金碧辉煌现在已不见了，因而在评价它们时出现了许多误解。”近代以来的学科分割，分门别类的研究，又阻断了对它的整体认识。事实上我们在思想史、经济史和诗文、戏曲、小说、绘画等分门别类的历史叙述中所发现的种种变革和运动，都受着一个共同的启蒙鼓动。这就需要我们要像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倡的，进行“横通”的研究，从而认识它的本质，把握它审美的系统和完整。这样，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它的总体面貌。这是一个历史主义的认识过程，需要我们运用章学诚又说的“纵通”的方法给予历史的定位，在看到它的整体表现的同时，纠正我们认识上的某些偏颇。所以，我做的仅仅是这类沟通的工作，其中所运用的材料，许多也是曾被一些通史和专史、专论引用过的，如有不同的解读，愿与大家切磋。此外，在许多著述中，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一些特殊领域中的研究成果，我惊讶地发现，已有不止一位学者注意到了研究对象所表现的特异色彩，一些专著、专论都能与当时的启蒙背景沟通，有的甚至已在敲响中国这扇“文艺复兴”的大门，这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也使我相信，我的研究不是孤单的。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参加过许多明清小说讨论会。其中，在大连举行的第一次明末清初小说会是我应林辰兄的邀约赴会的。其时，适逢大连图书馆积年珍藏的明末清初的小说（大多数是才子佳人小说）整理出版，共 30 余种，其中不少属于海内孤本。会上慨赠与会者，使我读到许多过去难以读到的书。图书馆的慷慨无私，值得在此大书一笔。如今有的会议发起者和组织者如大连的于植元、《金瓶梅》会的积极组织者刘辉兄已先后去世，令人惋惜。我所参加的这些讨论会，都专重于学术的研讨，对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展大有裨益。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钱中文和人民文学出

版社资深编辑杜维沫二位先生的鼓励，中文还慨允为序。此外要说明的是，本书有几幅摄影插图是秦伯益院士提供的。他是我中学时最敬佩的学长，从岗位上退下来后，得暇旅游各地，他又喜摄影，听说我正撰作是书，慨允为我选几幅难得的摄影作品配作插图。这些都是我要感谢的。

本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已写出部分章节的初稿。后来由于本人退休，曾长期弃置未问，直到 2004 年才重新拾起，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立项。没有院里的支持，恐怕我就要放弃最终完成的打算了。因为像这类跨学科的研究，许多都超出了我所从事研究的领域，其中的繁难是可想而知的。现在总算勉为其难地完成了，终于可以令我长长地舒一口气。但愿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开始，抛砖引玉，期待有后续的精进，使这一研究更为完善。出版方面，还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因而才得以有与读者见面，接受学术检验的机会。本书责编在审读全书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这些也是我要感谢的。

2008 年 11 月 16 日

序

钱中文

卢兴基先生将《失落的“文艺复兴”》书稿拿来要我看看，我一看这部著作的题名就感到十分新颖。中国是否存在过类似于欧洲发生过的文艺复兴思潮，或是文艺复兴的时代？有的外国学者讲，曾经发起于14世纪、随后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思潮，早在8世纪的中国就已发生，然后这一思潮西移，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一直延伸到17世纪的大西洋沿岸国家。有的学者说，从7世纪唐朝初期到15世纪明朝中期，是中国文学的文艺复兴时期；或是说，14~16世纪发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其第一个阶段，18世纪德国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第二阶段，20世纪初出现了“斯拉夫文艺复兴”，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三阶段，但在俄国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梁启超也曾经说过，清朝是“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胡适等人则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文艺复兴，等等。今天有一些学者提出，当今的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上述这些观点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可以探讨、商榷，但是卢兴基先生的《失落的“文艺复兴”》，却以大量确凿的资料，准确的引证，宏阔的综合观点，极富创造性地从整体上为我们再现了在历史上曾经被长期淹没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思潮与运动。就这点来说，它体现了本书的重大现实价值与独创性。

从明朝中期嘉靖朝开始，经万历、天启而至明末崇祯以及清初100多年的这段历史，中国社会发生过重大的变化。中国封建社会在长期发展中，终于通过自身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的原则一旦兴起与确立，旧有的社会秩序、价值观必然走向衰颓与崩溃，随之出现了被人称为“天崩地坼”的局面。与此相应，在作为舆论准备的新的意识形

态领域里，出现了张扬个性，反对封建禁锢、封建礼教、宗教神学，以及批判泯灭人性的理学思想与反禁欲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一反过去的道统，主说“天地万物为一体”，崇尚自然“人性”，把饮食男女视为自然的“人性之体”；他竭力标榜“百姓日用”，所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即应该面向老百姓的生活实际，并且极具挑战性地提出，凡是离开这一原则的学说皆为“异端”。由于这一学说的倡导者出身平民，思想一改旧说，适合中下阶层劳动者的生存与利益，所以深得下层群众的欢迎，而成为启蒙先驱。稍后出现了一批极有思想和学问的追随者，如何心隐、李贽等人，他们反对理学，宣扬“人欲”，反对以“天理”灭“人欲”，认为人皆有欲，指出“无私之说”的虚伪，称“天下何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从而肯定了个人利益的合理性。李贽还公开赞扬商人的经商行为，将生意与力田置于同等的地位。这种理论在当时确是振聋发聩，具有反传统的特色。李贽的“童心说”进一步标举自然人性，提出童子乃人之初，而童心则为心之初，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真心”，后来人们所以失却真心，乃是“圣贤”之书毒害所致，结果是“假人言假言”，做假事，写假文，而失去真。当时对李贽思想的反应是：“最能感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若狂”，“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夹一册，以为奇货”。可见其思想流风所及，影响极大。启蒙思想、反传统思想、反道学精神、反禁欲思想的锋芒所向，一时有如狂澜巨涛，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何、李等人先后被迫害致死。但与他们的启蒙哲学、社会思想相呼应，在文化思想界形成了一股人文主义的潮流，特别是在文学艺术中，出现了文学艺术的新说，其中，李贽的“童心说”产生了重要影响。诗文方面，有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的唐宋派文学；有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个性主义。在小说创作方面，则出现了宣扬巨人精神的《西游记》，极尽市民社会风习描绘的《金瓶梅》，反禁欲主义的“三言”、“二拍”等，以及戏曲“临川四梦”等唯情主义的强大浪漫思潮，等等。而这一时期的绘画，突破院画传统，出现了“文人画”的理论主张，以及极富个性、脱尽窠臼的“我行我法”、天姿超迈、立意创新的自由创造精神，别开一代生面。17世纪文人画替代院画，确立了前者的画坛盟主地位。所有种种，从各个方面汇成了一股名副其实的、启蒙的、人文主义思潮的伟大洪流。

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我国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已经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有的思想史学者，已把明清学术当做启蒙思想史加以探讨，分段论及不同时期启蒙思想家们的各方面的思想与活动。但是也存在不足，即如本书作者所说，“过去的条块分割的叙述，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些不相干的思想家、小说家和戏曲家以及诗文作者。实际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结成某种风格流派，都是受共同的一个启蒙鼓动”。其实，这种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从这点来说，我们恐怕还缺乏一种宏观的、综合的、整体的全局观念，来理解和阐释历史现象，还缺乏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方法论。人们研究历史文化现象，往往就事论事，治思想史的谈思想史，治作家研究的写他的经历，治小说的除了研究其艺术上的得失，有的人还枝节横生地对小说里未被揭示身世的人物，进行猜测与烦琐的考证，把虚构当成史实。由于把整体的文化现象当做缺乏联系的、互不相干的、个别的、孤立的事物，于是使得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被分拆、割裂开来，使得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潮失去了历史的整体性，遮蔽了历史原有的面貌。本书恢复了文化研究的历史综合性与整体性，在历史的综合与整体的展开中，汇集了一个时期文化思潮的方方面面，恢复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把握了明朝嘉靖之后100多年间所出现的作为启蒙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共性与各个相关方面的各自特征，从而清晰地凸现了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独特风貌。

本书的另一个特征，是它有意识地运用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由于比较文化研究涉及的知识面广，所以操作起来难度较大。本书作者将明朝嘉靖后的百年间我国所掀起的人文主义文化思潮与欧洲发生过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相比较，使人觉得绝无牵强附会之感而恰到好处。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及其伟大作品作为参照系，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明朝中叶以后一批思想家的那种反叛封建旧说、争取人的解放而形成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伟大意义，表现了人的至情的文学理论在促进人的解放运动中的巨大作用。通过与《巨人传》、《十日谈》等作品的比较，使我们增添了阅读的方法，进一步理解了《西游记》中的“巨人”精神，看到《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转折时期的市民社会风习，更深刻地领悟到“三言”、“二拍”中的反禁欲主义，品味独抒性灵的散文，以及情可以使人死也可以使人生的《牡丹亭》等。

本书资料丰赡，搜罗极广，论证缜密，评析客观，极富史识，显示了一种宏伟的历史观。特别是对于一些存在争论的问题，作者每有立论，总能做到摆开多种观点，在相互的比较中，得出合理的结论，令人信服。作者使用历史的偶然性即清兵入关，重新恢复旧有理学的思想传统，加上汉族自己的

学者在对明朝兴亡的反思中对明代启蒙思潮的守旧的批判与鄙薄，来解说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所以在后来的失落，也是言之成理，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恢复明代中期后的一段历史文化的原貌，十分重要，极有启迪意义。

本书是一部酝酿多年，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观念上多有创建的著作，也是探讨我国文化思想的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著作。

是为序。

2008年1月20日

目 录

CONTENTS

自 序	1
绪 言	1
第一章 一段失落的文明	9
一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走向	10
二 中国人提到过的自身民族的“文艺复兴”	17
三 文明的失落与确认	21
第二章 时移世变的 16 世纪	32
一 自由手工业在竞争中发展	32
二 资本主义萌芽中的商业	44
三 旧生活的解体——明朝人自己的感受	59
第三章 土生土长的人文主义	71
一 泰州学派首倡乱道	71
二 早期启蒙的旗手——李贽	85
三 人的觉醒	93
四 一群时代的弄潮儿	97

第四章 唯物论思想和明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110
一 唯物论的启蒙哲学·····	111
二 明代中叶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成就·····	116
第五章 个性主义的文学思潮·····	127
一 明代的复古思想与唐宋派的古文革新·····	128
二 横扫复古阴霾的诗文批评·····	135
三 公安派诗人的“独抒性灵”·····	142
四 个性主义的延续·····	154
五 古文的异变——晚明抒情小品·····	161
第六章 16 世纪文化观照下的通俗小说·····	173
一 长篇创作在读书人群体的参与下呼啸而起·····	174
二 短篇小说“拟话本”应运而生·····	185
第七章 《西游记》的巨人精神·····	195
一 唐僧西行，故事东渐·····	195
二 吴承恩对西游故事的改造·····	200
三 孙悟空——16 世纪中国的巨人·····	202
第八章 《金瓶梅》——演绎商人的小说·····	211
一 《金瓶梅》里的一个新兴商人·····	212
二 商人的生意经·····	225
三 封建社会没落中的价值取向·····	234
第九章 “三言”、“二拍”的反禁欲主义·····	241
一 世纪交替的时代催生了“三言”、“二拍”·····	242

二 商人——时代的新角	257
三 寺庙、尼庵里发生的故事	264
第十章 “三言”、“二拍”里写的近代爱	270
一 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喜剧	270
二 启蒙观照下的审美	280
第十一章 徐渭戏曲反道学的民主精神	290
一 明代曲坛的一位怪才	290
二 欲令拔舌的讽世喜剧	293
第十二章 唯情主义的浪漫思潮	
上篇：汤显祖的“临川四梦”	303
一 浪漫思潮的滥觞	303
二 汤显祖《牡丹亭》中“主情”的近代审美	307
三 笔底翻新意——“临川四梦”的另外三部梦作	315
第十三章 唯情主义的浪漫思潮	
下篇：才子佳人小说	326
一 才子佳人小说的兴起	326
二 浪漫的审美	339
三 以“情”为婚姻原则的近代主题	347
第十四章 文人画在与院画统治的斗争中主盟画坛	353
一 明代院画的衰落	354
二 董其昌的“文人画”论	359
三 析“南北宗”论	372
四 文人画在明中叶至有清一代的表现	379